

台灣領導人對大陸決策的情感

● 石之瑜

研究兩岸關係形同研究者進入研究對象身份意識的過程。研究者基於自身的情感反應，得以透過模擬或移情，進而揣摩研究對象的情感反應，詮釋研究對象的行為動機。不過，情感狀態與移情能力都是複雜的心理過程，受到文化與社會環境的制約。因此，出自不同文化脈絡或社會情境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又難以建立完整的情感溝通機制；就算移情者擁有豐富的經驗與充分的練習而更能轉移情感，使他們之間享有相對充分的溝通機制，但在研究者及其讀者之間，還是有幾乎不可跨越的鴻溝。

是否可以說，情感研究發展到甚麼地步，兩岸關係研究的深度也就只能發展到甚麼地步？本文試圖對此加以分析。

一 認知與情感

目前對情感的研究可以分為兩支，其一是方興未艾的認知心理學^①，其二是精神分析^②。

(一) 情感的功能

情感是一種影響行為傾向的心理狀態，通常各種語言都發展出表達不同情感的詞彙。最粗淺者可以把情感歸類為正面情感與負面情感^③，但這樣的分類不夠細緻，對於理解行為意義幫助不大。情感具有比思考更快的反應功能，而不僅是正負面的評價。在遭遇外在刺激的時候，行為者總是先感到某種情緒的發生，然後才會去思考其原因。比正面或負面情感更常見的，是探測有無機會感或威脅感，前者促成行為者積極追求的熱情，後者則帶動積極防衛的焦慮。

認知心理學家確實發現，情感往往先於認知受到外界的刺激。認知記憶庫可分為長期記憶庫與工作記憶區，工作記憶區的容量有限，但是當新的數據從長期記憶庫調到工作記憶區，而將原本在工作記憶區的數據送回長期記憶庫的時候，被擠走的數據並不會將與該數據相關的情感一起帶走^④。換言之，在一連串刺激發生的時候，新的情感會不斷加入既有的情

研究兩岸關係形同研究者進入研究對象身份意識的過程。研究者基於自身的情感反應，得以透過模擬或移情，進而揣摩研究對象的情感反應，詮釋其行為動機。

政治學家最關心的戰爭與選舉，均涉及到機會感與威脅感。發動戰爭的動機主要是掌握機會或排除威脅；而投票支持某位候選人的動機主要也是由於這位候選人帶來契機或其他候選人帶來威脅。

感，構成新的情感整體。既然外界刺激首先帶動的是情感，那麼情感所引發的記憶當然是可以使這一情感合理化的數據；同一類情感所刺激出來的同一方向的合理化記憶不斷累積，形成所謂「先入為主」的心理現象。在長期記憶庫裏，先入為主的情感方向，便進一步造成所謂的「刻板印象」，而這一印象並不總是符合行為者自己所設想的狀況^⑤。

不過，如果說情感總是先於認知，那麼何種情感會被引發？而行為者又是如何決定或移轉情感的引發呢？

刻板印象的形成自然仰賴社會制約，使成長中的人能在社會化過程中養成與主流社會類似的對事物的情感反應。學習並養成情感是與生俱來的能力，而學習必須是與社會情境中的具體現象結合，並藉語言加以表達，於是不同性質的情感就逐步儲存在記憶庫裏。較常見的情感包括高興，這是心願達成時的情感；生氣，是在本該達成目標卻遭遇阻撓時的情感；藐視，是對旁人的存在或行動結果加以前否決時的情感；緊張，是面臨不確定狀態時的情感；等等。

在遭遇不熟悉的狀況時，行為者必須對各種蛛絲馬迹加以拼湊，才能產生整體的印象，故相較於刻板印象式的認知如同某種鯨吞法，以拼湊所完成的印象則可說是某種蠶食法^⑥。其實，蠶食法是小規模的鯨吞法，雖不是仰賴某種提綱挈領的大觀念來反映早已形成的情感傾向，但依舊必須靠對各種細瑣特質的刻板印象加總，來確認自己面對的是機會或威脅。這表示，情感比語言或由語言所構成的思想更為直接，情感是行為者與社會互動時最基礎、快速、有效的機制，進入某一種情感狀態因而是人類認知到自身存在從而獲得社會集體生活意義的本能^⑦。因此，我們在了解研究

對象的行為之前，就必須先探測其情感。

前述機會感與威脅感是兩種政治學家最感興趣的情感現象^⑧，因為政治學家最關心的兩個課題——戰爭與選舉，均涉及到機會感與威脅感。發動戰爭的動機主要是掌握機會或排除威脅；而投票支持某位候選人的動機主要也是由於這位候選人帶來契機或其他候選人帶來威脅。「機會」與「威脅」都是進化的學術用語，而較赤裸的用語無非就是「熱情」與「仇恨」。

政治學家重視分配資源與價值的積極行動，因而將注意力集中在促成行動的情感，卻忽略了具有遏制效果的情感。其中遏制熱情的情感就是沮喪，指涉在認知到目標不可達成時的感受；而與仇恨相對的情感則是焦慮，指涉對不確定狀態的警覺。熱情促使行為者追求某種目標；沮喪造成行為者放棄目標；仇恨促使行為者排斥旁人；焦慮則造成行為者自我防衛^⑨。這四種情感構成行為者與社會互動的基本前提，並可以快速傳染給周遭體會到自己情感狀態的其他行為者^⑩。

(二) 認同與形象

消極的情感如焦慮與沮喪關乎自我形象。所謂形象，是指行為者所獲得的社會認可，若行為者擔心不能獲得認可便會產生焦慮，進而進行自我調整。對自我形象的關切驅策行為者不斷探測社會對自己的評價，因而是行為者與社會求同的過程，或小我向大我認同的過程^⑪。行為者主要的參考依據不是其他行為者的表現如何，而是自身與社會所設定的標準有多大落差。對形象重視的結果，是行為者訴諸自我砥礪，行為的對象最終變成了自己，即使在邁向理想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心生對失敗者的藐視或對領先者的嫉

妒。不過其他人的表現只是自我形象次要的激勵，主要的還是靠自己的努力。

積極的情感如熱情與仇恨則關乎自我認同。所謂認同，其基礎在於能界定差異^⑩，主要是行為者與那些會混淆自己獨立認同的人之間的差異，或行為者所認同的團體與會混淆團體認同的其他團體之間的差異。注重形象是向他人追求認同，所以無時無刻不顧及他人的評價標準；尋求認同則是透過界定異己限縮自我認同的範圍，以自我的需要為中心，在追求目標時一般毋須顧及他人的觀感。倘若行為者對他人產生的不良效果有所顧及，這也主要是出於自我中心的動機才不得不接受某種規範，以免因為惡性競爭造成兩敗俱傷。

認同的力量促成佔有欲，積極面是攫取，消極面是排斥。一方面，佔有欲可能引發不符成本效益的投資，一心只想佔有各種可能引發欲望的對象，如處女地、珠寶、冠軍杯；等等。另一方面，為了鞏固差異而採取各種歧視性的手段，對最接近自己的對象採取人我之別的區隔，排之為異己，甚至虛構異己，以便容許某種排斥的行為得以發生，致使排斥的過程比排斥的對象更能鞏固自我認同。尤其是那些可能模糊人我疆界的對象，如父母兄弟，最可能對自我認同帶來嚴重的威脅，更必須予以排斥。不斷進行排斥的過程，足以對自我認同產生複製的效果，透過營造被入侵、被污染的恐懼感，凝聚自我認同^⑪。

二 精神分析與情感

至於自我形象與自我認同的動力源自何處，似乎超出了認知心理學實驗的範疇，所以就算可以將情感的形成歸於形象與認同的實踐過程，仍不

能說明甚麼樣的情感會在哪個時空中主導，或在甚麼情境下會出現轉移。形象或認同是每個社會必定有的社會過程嗎？如果每個社會上出現的行為動機，最終可以粗略地歸結到熱情、仇恨、焦慮與沮喪，將其他語言可以表達的如高興、生氣、藐視、討厭、喜歡等都經由相關性分析納入以上四個類別，那麼探究人類行為深層動機的答案，就在於對形象與認同兩個社會過程的溯源了。

在刻板印象中，形象是東方社會的動力，認同是西方社會的動力；前者反映恥感文化，後者反映罪感文化；前者為群體導向，後者為個體導向。但是精神分析對這樣的說法不以為然。精神分析與情感研究的銜接點，是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關於本我、自我與超我的著名理論^⑫，因其理論回溯自嬰兒初生，以致無法實證，益加不為當代科學家所採信^⑬。然而，精神分析並非全然無的放矢，蓋嬰兒初生之際，由於脫離母體而感受存在，首先承受的就是地心引力帶來的墜落的力量以及腹餓的感受。這樣對自己存在本身的負面感受，基本上因為母親的撫養而平撫，對母親的依賴猶如獲得宰制世界的權力，在需要時能獲得哺乳與懷抱。這樣的形勢隨着嬰兒的成長而變化，母親的角色一分为二，好的母親哺乳，證實了權力的中心在自己；壞的母親未能及時哺乳，被拋棄的恐懼油然而生^⑭。兩種母親均在語言能力完整之前就進入孩童的記憶，這樣的記憶缺乏文字，因而只能是情感的與潛意識的。及長，社會規範益嚴，自我與社會之間形同權力鬥爭，在那個自我中心的本我與限制自我中心的社會之間，社會取代了母親的雙重角色：一方面是依附歸屬以取得無盡權力的對象；另一方面是壓制剝奪與拋棄的威脅根源。

在刻板印象中，形象是東方社會的動力，認同是西方社會的動力；前者反映恥感文化，後者反映罪感文化；前者為群體導向，後者為個體導向。但是精神分析對這樣的說法不以為然。

儒家天下文化興起以降的華人地區重視自我形象的過程，又稱為面子文化或恥感文化。相較於歐洲的人本文化與罪感文化，基督教文明與儒家文化的分別開展，將人類原始的情感力量演化成了語言可以表達、制度可以規範、行為可以追蹤的社會過程。

精神分析的政治學是關於個人與社會之間權力關係的分析。此處所謂權力，指的是宰制的需要。宰制需要強者更能不顧一切，意志較為堅定則權力就大；宰制需要強而無法宰制者，便需要尋求強者代為宰制。宰制又需要有被宰制的對象，對象可以是物體也可以是群體^①。精神分析對權力的敏感，反映在有關焦慮的討論中，認為焦慮來自於可能被入侵的莫名恐懼^②，因而與之前討論的焦慮是同一性質的，亦即擔心隨時可能無法繼續獲得所屬群體的認可而汲汲於表現依附與紀律。

精神分析說明形象與認同兩個社會過程，乃奠基於人性之中，歸屬與自我中心兩種需要是一體的兩面。其中，精神分析中講的超我是歸屬於社會，本我則是展現自我中心；歸屬於社會的需要產生求同的過程，展現自我中心的需要則產生求異的過程。前者為獲得認可而焦慮，因為達不到被認可的目的而沮喪，促成自適應與放棄目標兩種行為；後者因自我滿足而有熱情，因排斥異己而有仇恨，促成追求與排斥兩種行為模式。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以降歐洲社會中的異教徒，在文化思想與制度上重視自我認同的過程^③；儒家天下文化興起以降的華人地區則重視自我形象的過程，又稱為面子文化或恥感文化^④。相較於歐洲的人本文化與罪感文化，基督教文明與儒家文化的分別開展，將人類原始的情感力量演化成了語言可以表達、制度可以規範、行為可以追蹤的社會過程。但在同時，恥感文化雖未有系統的滿足自我中心的需要，但並不能扼殺這樣的需要；同理，罪感文化雖未有系統的滿足依附歸屬的需要，但也未能扼殺之。

形象的過程猶如爭取壞母親的認可，爭取不到將令人沮喪，但若爭取

到便使壞母親成為自己認同的對象，形同成為自己的化身，故爭取的過程令人焦慮；認同過程便是奠基於好母親的溺愛，凡事都可任性，但好母親一旦無所不在地籠罩自己，反而可以成為威脅入侵的異己，促成排斥的情感。好母親與壞母親不存在於語言的範疇中，行為者藉由促發權力行使對象的響應，將行為者的焦慮或仇恨傳染給行為對象。認同的過程既是在尋求母親賦予的無邊權力，又是在排斥母親而成為獨立的自我；形象的過程則既是在尋求成為母親的化身以及以母親作為自己的化身，又是在無助地接受母親的遺棄。以社會作為母親的模擬或投射，將個人與社會的權力關係轉化成幼兒與母親之間的權力過程，讓認知心理學在實驗室裏研究的情感有了出處，也讓語言中已然五花八門的情感成為可以簡化分類的行為系數。

三 台灣與兩岸政治關係

(一) 兩岸政治關係中的欲望與歸屬

兩岸政治關係的歷史背景包含了幾個重要的脈絡，包括台灣曾為日本殖民地、國共內戰與冷戰，同樣重要的是兩岸分享了儒家文化。兩岸關係研究的主體難以明確界定的原因恰在於此，可以是內戰的兩造、殖民地與母國及祖國的尊卑角色、頻繁互動的社會(社會中的家庭、商人、移民)與全球霸權介入後的國際關係等。台灣方面的教育內容與風格同時兼有中華、日本與美國三大面向，所以台灣知識界與社會菁英的生活、思想，均具有至少三種紛雜性。

第一種是身份的紛雜性與隨之而來的自我論述的紛雜性，原本看似不

兼容的價值如孝道、合群、犧牲與自由、創意、開放均受到重視，其結果是，當某一種價值或身份受到壓抑之際，台灣人民調整的可能與效率都超過其他社群。兩岸關係的性質隨台灣人民各自在當下所進入的身份意識而轉移，經常不受到由上而下的政治介入所壟斷，以致出現看似互斥的情感共生。比如，在內戰脈絡下面臨光復無望時的情感可能是沮喪，移至儒家文化脈絡下成為傳承道統的熱情；在冷戰脈絡下依附於美國扮演圍堵棋子的焦慮，移至殖民史脈絡下成為利用美國支持對大陸排斥的情感。

第二種紛雜性在於自我認識風格的形成過程中，同時具有自我中心與社會歸屬兩種動機。比如，以某一種身份觀之，身為商人的台灣人，既具有資本主義之熱情追求物質欲望而破壞知識產權的自我中心動機，又有焦慮地表現成第三世界楷模而獲得尊敬的社會歸屬動機。個別具體的商人跨海投資的動機可有兩重：為了滿足物質欲望的投資與為了虛榮與地位的投資。又比如，以某一種價值觀之，追求民主自由的台灣人，既表現熱情追求自由放任而抗拒任何政治法律束縛的自我中心，又表現焦慮渴求旁人（尤其美國）認可自己屬於民主自由陣營的社會歸屬。這種紛雜性造成行為者自我中心的熱情追求顯得膚淺，因此必須回溯熱情的源頭，這時看似投資牟利的熱情或維護民主自由的熱情，充其量是在表演給外人看——或追求強者嘉許而感到心安，或成為弱者模範而感到榮耀——因而帶有等待社會認可的焦慮。故熱情的模樣所塑造的自我中心感覺，比實際上得到投資報酬或享有民主自由重要得多。此種行為的過程比實質結果更為重要。

第三種紛雜性在於母親角色的不確定，因為可以扮演好母親與壞母親

的對象超過兩個，以致糾纏不清，造成每個對象都可能同時是好母親與壞母親，則自我認同所仰賴的差異變得難以界定。比如，作為形象的中國可以是讓台灣戰敗成為孤臣孽子而沮喪的壞母親，但也可以提供一個歸屬於悠久歷史文化而製造責任與角色焦慮的大我；同理，作為認同的中國可以是促成台灣人們毫無顧忌熱情追求統一的好母親，但也可以是讓台灣產生對異己仇恨排斥動機的壞母親。

下文從政治領袖在兩岸關係中的身份抉擇及其情感傾向，來分析兩岸政治關係得以開展的情感基礎及動機。

（二）兩蔣在台灣省的光復大陸

1. 認同自我的需要與形象歸屬的需要。光復大陸曾是台灣省面對兩岸關係的主要價值，不過，其種種準備或宣傳同時滿足自我中心與歸屬大我群體的兩種欲望。基於自我中心的欲望，即使孤臣孽子光復大陸的機會如此渺茫，母國之愛的想像仍如好母親一般支持政治領袖堅持推動，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並嚴懲質疑者或背叛者，因而在兩蔣時代誰也不能質疑光復大陸的目標。另一方面，基於歸屬群體的欲望，光復大陸又是政治領袖及其人民維護自己臣服於中國的正統，進而如同在壞母親要求下不斷為之做出各種犧牲，不敢須臾懈怠，以強化鞏固自己所宣稱的復興基地屬性。對處於需要如此臣服的領袖而言，真正能夠光復大陸的實質進度，遠不及於維護光復大陸作為理想來得重要。光復大陸的理想容許國民黨繼續以中國正統自居，因應着內生的壓力。然而另一方面，這樣的目標在軍事與政治兩端都遙不可及，國民黨寧願失去邦交國或支出龐大軍費，也絕

作為形象的中國可以是讓台灣戰敗成為孤臣孽子而沮喪的壞母親，但也可以提供一個歸屬於悠久歷史文化而製造責任與角色焦慮的大我。作為認同的中國可以是促成台灣人們毫無顧忌熱情追求統一的好母親，但也可以是讓台灣產生對異己仇恨排斥動機的壞母親。

民主已是台灣知識界面對兩岸關係的主要論述，而力求在兩岸關係有所突破，以認同本土、建立新中原為訴求的李登輝，推動憲政改革，以民主之名建立直選制度。伴隨着大量的反華主張，李登輝將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訴求連結。

不接受友邦設想的其他出路，抗拒美國曾安排的「兩個中國」妥協案，或法國總統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願意嘗試的「雙重承認」^②。這一點則又因應了內生的自我中心的欲望，展現出不可一世的固執。

2. 熱情與沮喪的情感。兩蔣均認同復興中華王道文化的傳統，儼然代表正統，以共產主義為差異所在之對象，使光復大陸成為一個充滿熱情的事業。如蔣介石堅持駐重兵於金馬，不顧美國的反對^③，甚至積極籌備反攻東山島的計劃。這樣的熱情固然出於自己對復興基地的認同，卻同時對他造成強大的壓力，因為目標無法達成而與沮喪的情感並存。光復大陸是要擴張復興基地的權力，令人熱情興奮；而對自己孤懸海島無以為繼的認識，則形成孤臣孽子的負面自我形象。早在1940年代末就感受到四周籠罩着死亡陰影而沮喪不已的國民黨，繼續演出自己都知道沒有結局的劇本。擴權的欲望與失敗的形象造成認同與形象兩種緣自看似不一致的情感動機輪流出現，時而熱情追求與時而沮喪放棄的相反情感竟相輔相成。

(三) 李登輝在國民黨的民主化與本土化

1. 認同自我的需要與形象歸屬的需要。民主已經是台灣知識界面對兩岸關係的主要論述，而力求在兩岸關係有所突破，以認同本土、建立新中原為訴求的李登輝，推動憲政改革，以民主之名建立直選制度。不過，認同本土的過程是以中國國民黨為差異所在之對象，故伴隨着大量的反華主張，李登輝將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訴求連結。民主的重要功能是以選舉產生本土領袖，賦予本土領袖更大的權力，進而影射新的台灣國民黨不再屬

於中國，海峽兩岸應為「一邊一國」。民主化實則成為奪權的手段，挑戰並推翻中國國民黨執政的正當性。中國國民黨如同外來政權，從造成李登輝依賴而無法獨立的好母親，變成了對自己的威脅^④。民主化的目的則是突顯新中原與舊中國之不同，因而在追求台灣國民黨自身獨特的認同。台灣國民黨如同壞母親，一旦能歸屬就取得認可。但是，李登輝擔心這種認可不能持久，因此在卸任之後，他又建立了李登輝學校，大量吸收國民黨的本土派，以延續傳承，反映他對民主化與本土化能否鞏固並無把握。所以民主既是一個政治鬥爭的自我中心欲望，又必須是台灣國民黨接受方能有效完成歸屬的榮耀成就。

2. 排斥與焦慮的情感。本土化以台灣獨立為其政治內涵，並排斥中國在國民黨的內涵之外，所以形成某種排斥老國民黨員的情感，積極抑制國民黨所傳承的內戰脈絡。另一方面，民主化既是本土化的工具，則當民主論述壟斷台灣國民黨的內涵之後，如何繼續傳承國民黨的本土化便成了重要的責任，以免李登輝的傳奇消失無形。這樣的焦慮，促使李登輝努力維持他作為《新聞週刊》(Newsweek) 譽為「民主先生」的身份^⑤，反而與繼任的歷任領袖維持某種傳承歸屬。故他雖在陳水扁執政期間大力批評國民黨，但在馬英九上台以後，他又轉向對陳水扁及其他政黨加以批判。可以說，李登輝在時代要求之下順應調整，力圖證明台灣國民黨路線得到認可，這成為他焦慮的主要來源。可見，對李登輝而言，民主化與本土化達到了奪權的功能，以排斥國民黨的中國屬性為至高動機，但也製造了能否傳承的焦慮；而平撫焦慮的努力，就是爭取當權者的接受。認同與求異的情感表現成對中國國民黨排斥的仇恨，形象

與求同的情感表現成建立並歸屬於台灣國民黨傳承的焦慮，由此，李登輝與國民黨之間便存在相互排斥與相互歸屬兩種情感。

(四) 陳水扁在台灣國的主權獨立

1. 認同自我的需要與形象歸屬的需要。主權獨立是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以降台灣政壇的最高價值。陳水扁執政以後，在國際上宣揚台灣主權獨立可謂不遺餘力，除了有「一邊一國論」、「廢統論」之外，他甚至支持藏獨，謀合印日反華聯盟，加入聯合國運動不輟。他以台灣之子的身份懷念福爾摩沙的母親想像，猶如福爾摩沙是放任溺愛的好母親，即使國際環境完全不利於台灣推動主權獨立，然而他仍帶領台灣各界樂此不疲，最後甚至挑戰美國，在抵觸美國利益在所不惜的意志下，發動公民投票來影射台灣主權獨立於中國之外。但是，台灣是否主權獨立似乎又是台灣各界並無信心回答的問題，因而透過亞細亞孤兒所影射的被中日美輪佔的壞母親，並在當下賣身給美國的擬想中，探聽大小各級美國官員、親台學者與國會議員在公開或私下的任何場合對台灣主權所做的任何支持性表達。如此，台灣一方面不顧美國的反對，執意滿足自己對主權獨立的渴求，另一方面卻不斷盼望得到美國認可台灣主權的蛛絲馬迹；前者充滿積極性與創造性，後者則充滿依賴性與虛假性。尤其在對美軍購問題上，主權獨立的信念幾乎全繫於能否擁有美國軍火一事上。

2. 熱情與焦慮的情感。陳水扁正是排除眾人質疑，不顧一切向國際主張獨立的最高領導人。他挑戰不可能，在國際上近乎向美國與中國奪權，甚至北京領導也不願意撻其鋒，凡事都先與華府商量然後由華府直接

應付台灣。這樣旺盛的鬥志與熱情反映出，自我中心的欲望不是單純的權力大小對比結構所能約束，有未達目的絕不停止抗爭的意志為後盾。不過，台灣主權獨立與否似乎又不是台灣單方面所能決定的，所以在屢次宣告台灣主權獨立之餘，陳水扁總是還要焦慮地觀看其他各地的政府如何表態，美國尤其如此被期盼，以致台灣主權獨立的論述還是不時地被置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框架中來審視。以美國盟邦自居，這就構成既要藉主權獨立超克美國，又要藉美國來認可主權獨立；既想要擺脫美國的利益，又想要接受美國的認可。這種抗拒美國且臣服美國的情感，在面對中國時也存在，是為熱情與焦慮兩種矛盾的情感共生。

(五) 馬英九在兩岸的不統不獨

1. 認同自我的需要與形象歸屬的需要。2008年之後，統一再度成為兩岸之間的可能選項，美國與日本的觀察家對此十分敏感²⁶，主因在於帶領國民黨重新執政的馬英九既反對台灣現階段獨立，也反對兩岸現階段統一，認同自己作為新台灣人。不統不獨的兩岸關係是新台灣人群體的歸屬，群體本身的分裂將使歸屬成為不可能，因此他只談中華民族而避談主權國家。既為同族，就不能反對終極統一的正當性，因而他只能宣告主權統一是他生前無法目睹的終極目標，以避免捲入統一而影響新台灣人的認同。於是，兩岸和解成為馬英九的巨大責任，中華民族像壞母親一樣將不能分裂且不能戰爭的重大道德期盼加諸於他。另一方面，統一的中國成為異己，也成為妨礙他營建新台灣人認同的好母親，他因而訴諸反共與人權的前提來排斥統一。

台灣主權獨立與否似乎不是台灣單方面所能決定的，所以在屢次宣告台灣主權獨立之餘，陳水扁總是焦慮地觀看其他各地的政府如何表態，美國尤其如此被期盼，以致台灣主權獨立的論述還是不時地被置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框架中來審視。

每一個台灣政治領導人在成長學習中養成特定認同與特定歸屬，但他們多元複雜的成長學習歷史，剝奪了他們仰賴唯一認同與唯一歸屬的可能性。這造成兩岸關係種種矛盾現象的心理緣由。

2. 排斥與沮喪的情感。馬英九的終極統一論並沒有表現出熱情，而只是一種排斥，表現成反共反專制的仇恨情感。這樣的情感時而流露，改變不了敵長我消的政治形勢，在終極統一太過遙遠而無法達成的前景中，馬英九無法以反對台獨來維繫終極統一的可能性。馬英九的沮喪之情從他必須不斷對台獨讓步可以看出來；為了取信台獨，他更具體表示自己生前看不到統一。認同新台灣人的情感促使他繼續反對共產主義與中國共產黨，歸屬中華民族的情感促使他必須與中國共產黨恢復關係以重建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形象。反共與聯共同時成為他給外界的兩種印象：反共具有主動性，聯共則顯得無奈；前者有理論也有價值支持，後者則沒有。馬英九對中國共產黨充滿排斥，又設法接受，以致不統不獨的終極統一論似乎兼具鬥爭性與妥協性。

四 結語

情感研究可以有助於我們分析兩岸關係，因為情感是動機與行為之間的橋樑。將情感的種類加以歸納，便能進一步探究行為者能動性的強弱與有無。至於動機如何產生，則可進一步借助精神分析關於需要的理論，包括自我中心的需要與依附歸屬的需要，得出自我中心導向的熱情與仇恨，以及依附歸屬導向的焦慮與沮喪，總計兩組四種情感。

西方文化重視認同與差異，追求的热情與排斥的仇恨是兩種較明顯的情感；東方文化重視形象與歸屬，認可的焦慮與遭棄的沮喪是較突出的兩種情感。兩岸關係因其歷史因素造成認同與形象兩種過程並存，每一種價值或每一個人都有自我中心的權力欲

望與犧牲小我的歸屬需要，都隨時準備好面臨好母親或壞母親，這間接說明了兩岸關係行為者兼容情感矛盾，擅長移轉的性質。

認同與形象兩個自我認識的過程並存，是兩岸關係對政治情感研究的重大啟示，也是認知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得以相互為用的重要突破。每一個台灣政治領導人在好母親的養成下，都必須有認同並區隔異己；也都在壞母親的規範下，必須有歸屬並自我要求。他們在成長學習中養成特定認同與特定歸屬，但他們多元複雜的成長學習歷史，剝奪了他們仰賴唯一認同與唯一歸屬的可能性。這造成兩岸關係種種矛盾現象的心理緣由。

註釋

① David P. Houghton, *Political Psychology: Situations, Individuals, and Cas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W. Russell Neuman et al., eds., *The Affect Effect: Dynamics of Emotion i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Behavio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② Norma C. Moruzzi, *Speaking through the Mask: Hannah Arendt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Iden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Sherry Turkle,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Jacques Lacan and Freud's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2).

③ Drew Westen, *The Political Brain: 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ding the Fate of the Nation*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④ Milton Lodge and Patrick Strohm, "Inside the Mental Voting Booth: An Impression-Driven Process Model of Candidate Evaluation", in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ed. Shanto Iyengar and William J. McGui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5-63.

⑤ Richard R. Lau and David P. Redlawsk,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gnitive Heuristics i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 no. 4 (2001): 951-71.

⑥ Susan T. Fiske and Steven L. Neuberg, "A Continuum of Model Impression Formation, from Category-based to Individuating Processes: Influences of Information and Motivation on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3, ed. Mark Zann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90), 1-74.

⑦ George E. Marcus, *The Sentimental Citizen: Emotion in Democratic Politic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⑧ Martha L. and Richard W. Cottam,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Nation Stat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1).

⑨ W. Russell Neuman et al., eds., *The Affect Effect*.

⑩ James M. Glass, *Psychosis and Power: Threats to Democracy in the Self and the Group*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⑪ James A. Holstein and Jaber F. Gubrium, *The Self We Live By: Narrative Identi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⑫ William E. Connolly,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⑬ Erik H. Erikson, "The Problem of Ego Ident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4, no. 1 (1956): 56-121; Dusan Kecmanovic, *The Mass Psychology of Ethnonationalism*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6).

⑭ Sigmund 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trans. Joan Riviere, ed.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2).

⑮ Richard Webster, *Why Freud Was Wrong: Sin, Science,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⑯ Melanie Klein, *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London: Hogarth Press, 1932).

⑰ Christel Hopf, "Authoritarians and Their Families: Qualitative Studies on the Origins of Authoritarian Dispositions", in *Strength and Weakness: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oday*, ed. William F. Stone, Gerda Lederer, and Richard Christie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2), 119-43.

⑱ Rollo May, *The Meaning of Anx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⑲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⑳ Chih-yu Shih, *Democracy (Made in Taiwan): The "Success" State as a Political Theo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90).

㉑ Bruce Jacobs, "Chiang Lost the ROC Its UN Seat", *Taipei Times*, 23 October 2005, 8.

㉒ 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274-80.

㉓ 李登輝年輕時對母親既依戀又反抗，困擾着他的成長。參見李登輝：《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㉔ Tony Emerson, "Making of a Democrat", *Newsweek*, 20 May 1996, 10-15.

㉕ Robert Sutter, "Cross-Strait Moder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Policy Adjustments Needed", *PacNet*, no. 17 (5 March 2009), www.csis.org/media/isis/pubs/pac0917.pdf, accessed 16 March 2009.

石之瑜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Asian Ethnicity*主編。